

社会转型与 青年发展

转型社会
研·究·文·库

卢汉龙 主编

杨 雄 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社会转型与 青年发展



中国青年研究学会

· 卷首语 ·

《中国青年研究》编辑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青年发展/杨雄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转型社会研究文库)

ISBN 7-80681-456-6

I. 社... II. 杨... III. 青年工作-中国-文集
IV. D43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807 号

· 转型社会研究文库 ·

社会转型与青年发展

文库主编: 卢汉龙

本书作者: 杨 雄等

特约编辑: 周琪生

责任编辑: 尹 蓉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640×935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456-6/C·016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卢汉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吸引着各种学科理论的关注。总的看来,不同的理论兴趣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二是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生成不同的理论发现。前者重在印证,后者勇于创新,都是在寻求对人类社会发
展更全更新的解释。由于中国的发展是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变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转型”特点。从转型的视野来对中国的变迁进行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可望对人类世界的发展理论做出突破性的建树。

有关社会转型的理论涉及到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值得在此一提:即转轨、过渡和转型。

“转轨”(transit)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转型概念。它本是取自“转车换乘”的意思,被用来形容经济系统运行方式的改变。转轨一般就是指经济的运行方式从计划走向市场,即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这是20世纪最后10年里发生的影响全球经济的一场大革命。在过

去的10多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原来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化转轨。这种被国外学者称为“后社会主义”的转轨涉及到欧亚30多个国家,总人口达15亿以上^①。只要想一想占世界1/4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急剧而壮观的变革,就不难理解对于这种大规模“转轨”现象的学术研究会是何等的挑战性和诱惑力。

“过渡”(transition)则是对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提供的一种描述和解释,即这个“换车转乘”是一个“过渡”的过程。首先是在经济层面,从旧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消亡和新的市场体制的生成,这本身就是一个过渡过程。对照一下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的“过渡”过程更是不难发现,中国经济转轨采取的是渐进改革的方式。这就和即刻转变的“休克”方法有所不同,它更是表现为一种“过渡”的形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延续性的,其转化也必定是渐进的,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需要保留旧体制的某些形式,转轨呈现为一个慢慢的过渡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对这个过渡过程的途径依赖加以研究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和苏东一些国家走的“休克”途径不同,中国转轨过渡的一种明显的特点是先允许从体制外生长出一块新的、靠市场运作的部分,我将它称之为“墙头经济”现象^②。转轨以全国搞特区、单位搞三产、企业搞三合(合资、合作、合营)等方式开始,也就是从国有体制的“墙边”“墙外”开始的。靠这种不断延伸的墙头经济一方面生出一个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墙外的市场推动墙内改革,使原体制逐步融入市场经济。这可以说是一种“民逼官让”的过渡,也可以说是“权力让渡”的过程。这种墙头经济型的过渡至今仍无结束,但是成效已甚

^① 参见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刘晓勇等译:《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见卢汉龙:《墙头经济与集体社会主义:从单位办三产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

明显。其间充满着中国人融会变通、求同存异的经世谋略和处事智慧。过渡理论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市场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逐步显现出来的。正如美国学者普兰尼在他名著《大转折》一书中指出的“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只能存在于一个市场社会。这是我们在分析市场制度时所得出的结论”^①。“市场经济”必然会逐步过渡到一个“市场社会”。经济转轨牵动社会变革是符合马克思社会分析所发现的原理的。至于如何来定义和观察这种社会的过渡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比如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也有学者将它定义为是一种消费社会或商业社会成长的过程,并以此来加深对市场化过渡的认识。

“转型”(transformation)则是第三个必然涉及到的关键性概念。既然是“转轨”、是“过渡”,那就暗示着有一个潜在的彼岸,那就需要进一步解释“去哪里?”,“对岸在何方?”,“结果会如何?”。转型是否有一个既定的模式等等,转型社会的研究正是需要探讨这些问题。如今就全球而言,经济转轨和市场化过渡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但是市场化的结果是否就是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家干预和社会承受市场竞争结果不平等的能力方面有没有区别?市场化所连带的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契约精神、公益伦理在各国的表现有无不同?这些问题和事实相对照都使人们宁可相信社会只是在“转型”,而不是在朝一种既定的社会模式“发展”。但是越来越多的市场化转轨的经验却表明,过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过程,尽管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本性,但是人的社会性本是一种具体的人文现象,决非只有一条道路和一种模式可行。转型理论强调对经济转轨和各种过渡状态进行解释,可是一旦涉及各种转变所导向的“结果”时便显得众说纷纭,

^① Karl Polanyi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1994, New York: Rinehart.

有时甚至变得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我们需要从变化中去认识,在存在中求发展。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渡理论同样需要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去认识,去发展。这正是编撰本文库的初衷。

现代转型发展的理论需要走出复制西方发展的潜规则,避免将发达国家的历史先入为主地命定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将要变为的现实。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论构建上确实需要从探究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出发,使用一些通用的概念和分析体系来研究和分析中国发展的事实。这样,了解已有的理论发现就显得十分重要。

就国际学术界而言,过往关于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区域性研究,局限于人文历史的视野范围,即所谓的“汉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中国的研究很难纳入世界主流理论的视野。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对世界发展理论的建树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全新的经验素材。美国社会学学会权威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1989年10月期,以首篇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康奈尔大学倪志伟教授的研究论文,题为《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①这篇论文通过对中国的研究资料论述了转型社会的一般性规律^②。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同时带动了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倪文的研究以及后来围绕着这个主题引起的争论使转型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倪志伟的学术贡献,在于用事实证明像中国这样具有长期国家控制传统和再分配权力强势的国家一旦引入市场制度同样会产生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市场化转型的结果: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交

①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681.

② 中文可参见边燕杰和笔者等人编译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版。

换中获益,权力的影响变小,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增强等等。这些曾经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出现过的转型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出现了。

但是中国转型所引起的学术界兴趣主要也许并不在于它证明了什么,而是在于它不能证明的是什么。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所证明的是西方学界的常规理论,其实已是学术“常识”,但依然未能解释中国转型中的一些具体的“特色”。比如政治的市场化问题、权力作用的延续现象、社会对市场控制的无力感、消费文化的兴起和对政治参与的麻木、城乡差别继续扩大和身份制度如旧、精英联盟和专业特质的失落等等问题。而且这些特色中有些却正是造成中国当今繁荣发展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倪志伟的市场化转型理论毕竟架起了转型社会研究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对话平台,激起了主流理论界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同时也促使我们从世界转型理论的角度更充分、更有理论高度地来认识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重构的事实。

就全球而言,经济的市场化转轨源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分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引起社会大转型的却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法国年鉴派历史家布罗代尔曾使用了三个主要概念来追述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过程,即: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①。他在讨论市场经济时指出: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在超过一定规模后自发产生的、必定具备的和十分普遍的基础。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表明,要实现现代化离开市场经济几无可能。但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出现了布罗代尔所未能述及的社会主义化趋势。在20世纪的大转型里,市场经济制度深入到

^① 见布罗代尔三卷本的纪实名著《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中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Librairie Armand Colin, Paris, 1979; 英译本参见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rans. by Sian Reynolds, New York 1979)。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这种竞争性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在19世纪的马克思时代乃至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完整的退休金制度,没有带薪水的假期,没有加班要发工资的规定,没有老年和健康的社会保险制度,等等。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政党开始通过民主选举走上执政舞台,发达社会建立起和市场经济制度相配套的国民福利制度。企业私人部门、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第三部分分别遵循竞争、再分配、互惠的交换原则,体现着市场、权力、社会不同的结构机制,一个和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了起来。

在20世纪大转折的市场经济制度里,“资本”的概念被泛化了。在整个经济生产过程中,“人力”开始挑战“资本”。劳动和资本这一对矛盾因为“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而走向统一^①。

一方面,由于竞争的需要,资本扩大所拥有的产权发生了分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兴起,并成为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产权社会化形式的迅速发展,最终导致了公司作为法人的概念和地位在法律上得到确立^②。法人所有权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财产形式,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产权私人化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格局发生了质的改变。股份公司中股东往往多于工人。这种所有权的分散化,要求股东的权益和公司法人所有权分别得到代理和代表。“产权”实际上被分解为所有权、经营(使用)权、收益分配权、财产转让权。各种权益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

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企业的管理阶

^① 人力资本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雅各布在1957年首先提出来的。它提示了人力的劳动和资本具有同样的性质:即追求最大的收益,从而将资本的概念泛化使劳动和资本这一对矛盾走向统一,求得平衡融合。

^② 梁慧星:《民商法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320页。

层。管理阶层对企业具有经营和管理的权力。他们对产权的支解直接造成人力对资本的挑战。管理人员既是产权的代表,资本的经营和使用者,他们同时也依然是资本的受雇人员,是一名劳动者。但是管理人员毕竟作为一个新式群体开始萌生,现代型的公司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也从此产生。

与“人力”挑战“资本”的经济转轨现象相对应,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孕育了现代社会制度文明。社会层面出现了“人权”挑战“产权”的现象。20世纪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对资本收益的限制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做出了许多根本性的制度设置,突出了普遍的“人权”而削减或贬低了私人“产权”的作用。比较重要的制度设置就是采取国家税收的办法加大对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力度。许多国家制定了累进的收入所得税制度,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等,以此来提高收入者的社会责任和财产转让或集中的成本。同时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第三部门得到蓬勃发展并且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伸张人权的作用。社会的再次分配保证了在利用市场机制激发财富涌流的基础上,满足社会的共同需求,实现以人为本发展的社会目标。教育普及使人力创造的价值在社会层面上直接得到体现。对劳动者权利的重视也成为20世纪人权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在各国工人政党、工会、国际劳工等组织的推动下,劳动者的权利得到广泛维护。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已不是任人宰割的“被剥夺”者。他们通过党派竞争、政治选举、集体谈判、民权运动等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得到利益表达,不同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护。从1930年代开始的美国“新政”福利计划到1960年代后至今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福利国家”制度,都贯穿着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全民共享社会进步成果的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转型的趋势不容忽视。

我们着力回顾20世纪市场转轨新进展及社会大转折的趋势,无非在于更清晰地注意到中国转型的历史条件和过渡的背景。我

们编撰这个文库,目的也是在于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发展,从中国的发展中进一步认识世界。转轨国家经济转型的成败,不仅事关这些转轨国家本身的命运,而且与整个世界市场格局以及社会制度形态和新型组织形态的演进紧密相联,对整个世界的前途和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对经济实行控制的方式和方法改变了,国家逐步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经济系统的运行开始尊重市场的规律,而成为一个越来越独立的系统。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将遵循完全市场型的规则来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2002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并且提出要全面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战略新概念昭示着在国内外政策上全面向“战时体制”告别。^①所有这些以中国人文智慧和富有战略眼光的举措,显示着中国的市场化转轨以及面临的社会转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转型所取得的成绩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小康思想和小康社会的许多理念均有现代发展的意义。从邓小平最初将小康作为一个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到当前继续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的“小康”事实上已经具有发展模式的意义^②。有评论家已提出“北京共识”的转轨模式以对照“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对中国转轨的成功经验予以莫大的肯定与关注^③。科学本无国界,知识在于积累。在中国的经济

①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强烈的“战时体制”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其实是从“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转变。参见卢汉龙:“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转变”,中国社会学会2001年获奖论文。

② 卢汉龙:《小康社会: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尹继佐主编,卢汉龙副主编:《小康社会:从目标到模式·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卢汉龙、李宗克:《图说小康社会》,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参见约书亚·库珀(Joshua Cooper Ramo)题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2004年5月11日由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出版。约书亚曾任《时代》杂志编辑。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引起不同国家的关注,它将形成一种可与“华盛顿共识”相媲美的发展模式。

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样会遇到人力与资本、人权与产权、民意与民主、物质与精神、法律与道德、科学与伦理、需求和环境资源等一系列人类发展中的共同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以认真探讨。

本文库希望针对中国转型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研究成果,以繁荣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这些成果的面可以十分宽广,但大体上会包括三类:(1)介绍性研究成果,即和转轨、过渡、转型有关的研究理论和已有的研究发现;(2)记录性研究成果,即对转轨、过渡、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变迁给予科学意义上的完整描写;(3)探讨性研究成果,即对转轨、过渡、转型的中国现象进行理论剖析和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文库的取材来自转轨与过渡中人口、社会、政治、法律、经济、道德、宗教等不同的社会面相,研究主要关涉结构变迁、组织重建、家庭与人生的生命周期、人文现象发展、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方方面面。文库研究出版的第一笔资金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重点研究方向的经费,我们希望将有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来关注和进入研究的文库,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大厦中璀璨的一部分。

(2004年7月)

引 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青年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单位、一个领域和一个城市发展的重大课题。十六大的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世纪的头 20 年既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当代青年创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据预测,2004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突破 11.5 万亿大关。这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意味着我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加速增长期;意味着社会将给青年带来难得发展和选择机会。从青年发展社会学视角看,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承前启后、充满活力、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代群,青年的发展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20 年后,今天 0~15 岁的未成年人将陆续地进入青年期,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生力军。因此,当前我们的制定社会政策,应把青年发展摆在社会优先发展的位置,鼓励有创新思想的青年脱颖而出,为他们发展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以实现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

一、青年发展的质量与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青年的发展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

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人不仅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结目标。社会发展说到底不过是个人本质发展的历史。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再由“经济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的转变,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是社会发展观念的重大进步。

中国是一个青年人口大国。从人口角度看,中国是一个青少年人口极其庞大的国家,据统计,到2000年,中国6至35岁人口达6.7亿,约占总人口的55%;其中,如果按照联合国(1985)对青年的定义,15至24岁的中国青年人口约有2亿,占总人口的15.5%;15至29岁的青年人口为3.2亿,约占总人口的26%。从就业角度看,我国青年的整体就业水平较高。全国的青年就业率(1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占同年龄组劳动力资源的比重)为79%。其中,15~19岁年龄组为65%,20~24岁年龄组为91%,25~29岁年龄组为94%,30~34岁年龄组为95%。此外,从青年就业的特点来看,既与其他年龄组成员一样,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形势,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之下,必须依靠经济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等等。

二、21世纪初青年已成为重要人力资源,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现实力量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科技与信息逐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青年已成为社会

重要的现实力量。就改革而言,青年是天然的改革支持者,青年人不仅要“敢为天下先”,而且更要“善为天下先”;就发展而言,青年是最具有活力的人力资源;就稳定而言,青年稳定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可以带来城市的稳定,可以带来一个时期的稳定。人们常说,经验、阅历是一种财富,其实年轻也是一种财富。所以,对“年轻”两个字涵义的理解应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年轻正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年轻人拥有观念上的优势;其次,年轻人拥有健康体魄的优势;再次,年轻人拥有知识的优势。

当下,青年创造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全总一项调查显示,在目前国有企业中35岁以下青年职工占70%以上。我们现在已经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青年实际上在起主导作用和领潮作用的社会。无论是创造,还是消费,都已成了青年人的世界。我们同样也能感受到青年在引导文化和社会变迁乃至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事实,青年精英(每年度评选出的“十大杰出青年”)行为方式对社会成员具有很大感召力和示范效应。现在的杰出青年不再是以往的劳动模范,他们大多是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的青年博士、青年教授或研究员;或者是创造了巨大财富和成功的青年企业家、青年技师等。

三、经济加速度发展时期,青年“反向社会化” 现象将越来越明显

所谓“反向社会化”是指,传统的受教育者对施教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即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当今学术界,关于青年反向社会化的文化意义有三种观点:

其一,文化先锋说。指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规模迁徙中,年轻一代总是无可争辩地充当了文化改革的先锋。

其二,直接因素说。青年一代更贴近时代而能向年长一代提供新知识、新信息、新的生活方式,因此,青年文化在促进社会变迁中起着更为鲜明、更为直截了当的作用。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文化反哺”现象的大量存在,促使青年文化由非主流文化向主流文化推进。

其三,正面功能说。文化变迁往往从青年的文化反叛开始的。变迁而形成的文化断裂,极大地造就了青年大文化反哺能力。当青年中先进的思想观点、生活方式、时尚潮流不仅为青年人所追逐,也为成年人所认同并接纳,青年文化就显现出极大的文化反哺功能。反向社会化,作为青年主流文化的大面积发生,正昭示着新一代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和影响。

纵观 1990 年代以来,我国青年在各方面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变化所达到的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打破了传统社会关系和规范体系对人们的束缚,动摇了固有的社会地位差序的定势,削弱了社会身份对其社会职能的限制,导致了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加速了其价值观念的分化。经济制度的变革决定了社会利益结构的重组,而不同利益关系的出现又给当代青年价值观的追求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方向和大显身手的发展机遇。

四、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和“申奥”、“申博”成功,为青年 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

仔细阅读十六大报告,我们会发现,提到青年发展的地方,粗粗算来至少有七八处。比如:(1)报告提出了“要打破选人用人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

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2) 提出了“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力度”；(3) 提出了“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4) 提出了“要选拔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5) 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6) 提出了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并“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7) 提出了“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一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8) 同时十六大报告也强调了“要加强对工会、共青团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特别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等等。

回顾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当代青年理应是本世纪中国最幸福与最幸运的一代青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成功，光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投入的 5 000 亿，就能拉动每年我国 2% 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并将给数百万青年人带来就业、创业的机会。随着十六大提出的创业融资机制、知识产权制度、私有财产保护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完善，当代青年创业发展机遇、机会会越来越多。因此，推动青年发展关键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年自主创业、发挥他聪明才智、脱颖而出以及健康安全的制度化环境。

以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主题。总的看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保持稳定、思想文化氛围开放宽松的社会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和巩固。可以预计，在未来的 20 年中，随着社会为青年生存与发展所能提供的条件和机会不断增多，青年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这样，青年价值观念中的不确定性也会由于在适应基础上的不断整合与统一而得到减少。